

潘易植

形而上学的背面 —— 托马斯·希恩《理解海德格尔》 书评

摘要：在《理解海德格尔》一书中，托马斯·希恩认为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都以克服形而上学为使命。希恩首先讨论了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之“主导问题”，也即何为存在者之根据这一问题的揭示。海德格尔批判了古希腊哲学，并通过现象学的范式，将存在者之根据也即存在解释为存在者的意义以及存在者与人的关联，从而重构了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海德格尔进而开展了对形而上学之“基础问题”的讨论，他又将存在界定为“澄明之境”，而“绽出之生存”与之必然地统一着，两者处于一种“映振”之中。随着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澄清，希恩也抵达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背面”，也即具体而现实的人的实践。

Abstract: In *Making Sense of Heidegger*, Thomas Sheehan proposes that both Heidegger's early and later thoughts shared the same mission of overcoming metaphysics. Sheehan discusses Heidegger's uncovering of the "guiding question" of metaphysics, which is the question of what accounts for beings. By criticizing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d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phenomenology, he reconstructed the guiding question of metaphysics by interpreting *Sein*, i.e., what accounts for beings, as the meaningfulness of beings and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s and humans. According to Sheehan, Heidegger then turns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metaphysics: He interprets *Sein* as *Lichtung*, which is necessarily linked to *Existenz* by means of *Gegenschwung*. With the clarification of Heidegger's thoughts, Sheehan succeeds in shedding light on the dark and neglected "backside"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which is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human beings.

Zusammenfassung: In *Making Sense of Heidegger* vertritt Thomas Sheehan die Position, dass sowohl Heideggers frühes als auch sein spätes Denken dieselbe Aufgabe, nämlich die der Ü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verfolgten. Sheehan erörtert zunächst Heideggers Problematisierung der Leitfrage der Metaphysik, d.h. die Frage, was der Grund des Seienden sei. Laut Sheehan kritisiere Heidegger die antike griechische Philosophie und rekonstruiere mithilfe der Phänomenologie die Leitfrage der Metaphysik, indem er das Sein, d.h. das, was den Grund des Seienden ausmacht, als die Bedeutsam-

keit des Seienden und als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Seiendem und Menschen interpretiere. Heidegger diskutiere dann die Grundfrage der Metaphysik, indem er das Sein als „Lichtung“ deutet. Eine Lichtung, die notwendigerweise mit der Existenz durch den „Gegenschwung“ verbunden ist. Mit der Klärung von Heideggers Gedanken gelingt es Sheehan, auch auf die im Dunkel gebliebene „Rückseite“ der traditionellen Metaphysik, nämlich auf die konkrete Praxis des Menschen ein Licht zu werfen.

Keywords: 形而上学, 存在, 实践, 海德格尔

托 马斯·希恩的《理解海德格尔：范式的转变》¹无疑是近年来海德格尔研究的一部巨著。希恩直言道：“过去五十年来，学界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各种主流方法（我称之为‘经典范式’）已经不再适用于讨论《全集》中已经出版的讲稿与论著所涉及的所有论域。”（第3页）在他看来，随着1989年《哲学论稿》的出版，“存在”已经不再能够充当海德格尔思想的最终主题。这并不是说，后期海德格尔进行了某种“转向”，从而与以“存在”为核心的前期思想相区别开来；而是说，无论是在所谓的前期还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之鹄的都是另一种东西。这一理解方式的变化也即希恩试图通过此书来实现的一种“范式的转变”。

当然，“存在”始终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重要术语，但在希恩看来，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恰恰在于对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的超越。借助海德格尔本人所分析的问题结构，希恩阐述了形而上学之“主导问题”与被形而上学所忽视的“基础问题”之间的关联。任何问题都可以被分解为三个环节：问题的对象、问题的形式或者说问题所选取的视角，以及问题的意义或者说问题的解释结果。形而上学之主导问题所发问的对象是存在者，而这一发问方式则是追问存在者之根据，而它最终的结果即是存在。在这一主导问题的支配下，形而上学止步于存在，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基础问题恰恰是以此为发问对象的。换言之，主导问题的终点才是基础问题的起点。在基础问题中，发问的视角是存在之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必要，作为这一问题的解释结果，它

1 托马斯·希恩：《理解海德格尔：范式的转变》，邓定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下文对该著作的引用仅随文标注中译本页码。

最终抵达的是某个更为根本的源头。而对于这一最终的结果，海德格尔也将其称为“存在本身”，也正是这一称呼困扰了学界多年，因为“存在本身”有时候也会被用来指称基础问题的对象。而除了这一术语之外，更为明确的说法还有很多，在希恩看来，海德格尔最终将这一作为基础问题之结果而非其对象的“存在本身”称之为“开抛的澄明之境”（第26页）。

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种“元形而上学”，它并不是要推翻形而上学，将其带向“终结”，而是彻底超越它的论域，绕到它所不能自视的身后的起点，抵达它的背面。这一工作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克服形而上学”。希恩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提出一种更为合适的理解范式来厘清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主张，“开抛的澄明之境”仅仅是一个初步的说法，它所命名的正是形而上学的背面。对此我们要问，借助希恩所提供的这一新的范式，我们在形而上学背面发现了什么？

希恩首先讨论的是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之主导问题的揭示，这种揭示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与超越而得以可能的。希恩认为，海德格尔的术语“存在者”所对应的某个“实在”的事物，而“存在”则对应着“实在本身”或者说“一般实在”，也即οὐσία。在柏拉图那里，唯有永恒不变地同一着的存在者才具有οὐσία；而亚里士多德则将运动本身纳入了事物的自身同一性，除了最高的存在者之外，其他存在者都处于“未完成”与“已完成”的动态统一中。对οὐσία的理解差异来自于两人对φύσις，也即涌现的不同理解。除此之外，这种理解的差异还体现在另一个同样古老的概念ἀλήθεια上。对于柏拉图而言，存在者作为εἶδος只能对于理智而显现，而个别事物只是这种显现的前台。而在《形而上学》第十卷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已经将个别存在者的自身显现，也即显现为“这”或“那”这件事本身称作ἀλήθεια。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超越首先就体现在对ἀλήθεια这一术语的分析上。希恩归纳了海德格尔对ἀλήθεια三个层面的界定：ἀλήθεια-3即命题与事实的一致性，它使得命题成为真命题；ἀλήθεια-2则是事物先于命题的可理知性，这也即亚里士多德所抵达的层面；但这种可理知性本身也以ἀλήθεια-1为前提，这种ἀλήθεια-1也即开抛的澄明之境。总而言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已经呈现出它的经典形态，它已经揭示了

存在者之存在，但也仅限于此；甚至，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也只是对这种更为本源ἀλήθεια-1有所知觉，而没有作出进一步追问。因此希恩总结道：“亚里士多德将海德格尔带到他自己、巴门尼德、胡塞尔乃至整个形而上学传统都未曾提及的问题面前。”（第89页）

那么，海德格尔的进一步追问，也即对形而上学所遗忘的基础问题的追问应当如何进行？在希恩看来，唯有现象学才能担当此任，只有现象学才能提供形而上学所欠缺的对ἀλήθεια-1的合适视角，这一视角也即对人的追问：“简言之，海德格尔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诠释，可做如下统括：‘就内容而言，一般的存在问题如果被正确地提出，就是关于人的追问’。”（第142页）希恩不仅将ἀλήθεια-1解释为“开抛的澄明之境”，而且首先将其解释为“绽出之生存”（第100页），唯有从两者的统一性着眼，基础问题的追问才能是完整的。而这种统一性只有借助现象学的视角才能被赢获。

在希恩看来，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出发重新解释了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第一哲学”，即“不再将事物的存在（*existentia*与*essentia*）视为中心论题，而被事物的意蕴性所取代”（第165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高的存在者也即自身即其目的的神，它完全实现自身并彻底显现自身；但对于海德格尔所恪守的现象学立场来说，对于有限的此在而言，存在者之存在必定以迂回的方式呈现为事物之意义，也即是说，存在者必须作为某物而存在。而存在者只有在人与之打交道的过程中才能被赋予意义，而此在作为意义的赋予者因此就是诠释者。通过这一现象学的范式，海德格尔将存在理解为存在者的意义以及存在者与人的关联，从而重构了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这是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的主要工作。伴随着这一重构，存在问题也就被引向了对人的追问。但也正如希恩所发现的那样，就正式出版的《存在与时间》的内容而言，它“仍处于主体的先验转向这一持续旷世之久的传统之中”（第178页）。

然而，希恩并没有割裂所谓的“海德格尔一”与“海德格尔二”的关联，他顺着海德格尔本人的论断“仅当根植于海德格尔二中，海德格尔一（的思想）才得以可能”（第286页），主张将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

都纳入“基础存在论”的范围中。因此,《存在与时间》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将此在这一诠释者把握为“绽出之生存”,海德格尔有时也将其表述为“此之在”。为了与带连字符的“此之在”相呼应,希恩也在通行的海德格尔术语“生存”中加入连字符,并将之译为“绽出之生存”,意在强调它“被迫而先天地居于自身,超越所遭遇的任何存在者’,亦即保持开敞”(第180页)。如果说海德格尔对此在的阐述所依据的是一种现象学的范式,那么对此之在的解释就是一种“元现象学”,它所讨论的是此在本身及其赋义活动如何得以可能。如海德格尔本人所说,“此之在”这一表述中的“此”“意指本有的开敞状态,即关于存在的本有的澄明之境。”(第182页)。

在希恩看来,本有的澄明之境是海德格尔思想所面对的“实事本身”,而绽出之生存与之必然地统一着。尽管《存在与时间》已然走在了对这一实事的追问道路上,但相比之下后期思想作了更为明确的推进:“从绽出之生存即在结构层面的澄明之境的开敞者和持守者转向澄明之境本身。”(第255页)然而,即使是在后期思想中,海德格尔也没有放弃《存在与时间》中业已提出的绽出之生存。希恩指出,海德格尔的表述容易给人引起一种误解,仿佛它从前期思想“转向”了别处,但“转向”一词严格来说首先意味着本有之中的某种运作,希恩建议以更为明确的“映振”一词来加以解释,也即“绽出之生存即*Da-sein*与澄明之境即*Da-sein*之间带有张力的同一性,即独有的来回运作(*reci-proci-tas*)这个统一现象”(第313页)。

这种映振是希恩所提出的新范式最后得出的结论,顺着希恩的指示,我们在形而上学背面所发现的正是绽出之生存与开抛的澄明之境的统一。在这种映振中,人依然占据了本质性的位置,若无这一追问方向,对开抛的澄明之境的追问只会沦为空谈。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的追问构成了希恩所说的“范式的转变”的真正要义。问题在于,什么才是“人”?在海德格尔那里,“人”首先意味着从开抛的澄明之境而来并持守其敞开状态的绽出之生存,这是他留给哲学史的壮丽景色。然而希恩无法认同他以存在历史来解释人类现实生存的尝试。尽管人有着如此本质性的维度,但他依旧生活在一个现实的、而非仅仅观念的世界中。现实的人类生存作为绽出之生存所具有的本源意义,但反过

来，澄明之境の開拋始終坐落在具体的人类活动之中。当然，海德格尔没有错失这一现实的维度，但他显然眺望着更为终极的事物，而我们也没有必要和他一块走到底。某种程度上，对人的追问不仅是希恩理解海德格尔的方式，也是希恩批判海德格尔的路径，尽管这种批判的资源恰恰也是来自于海德格尔。在希恩的解读中，海德格尔通过对人的追问而抵达了开抛的澄明之境；但或许对于希恩而言，这一追问的方式反而是更值得我们留意的东西。

因此，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妨再将希恩的结论推进一步，尽管这样将更远离海德格尔本人：形而上学的背面是具体而现实的人的实践。这并不是说我们在理论上将实践与形而上学相对立，而是说，实践乃是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层面，而对这一层面的察知与探索只能是“前理论”的。质言之，思的背后不是另一种思，而是“做”。在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唯有以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方式才得以可能，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先行抵达形而上学的背面。对于被形而上学所支配的理论思维而言这绝无可能，但这实际上唾手可得：每一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都扮演着绽出之生存的角色，并上演着澄明之境之开抛的这一剧本。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思想不仅包括“解析”，同时也具有“劝导”的环节，也即“劝导个体成为‘绽出之生存’本真地开展由绽出之生存赋予的可能的生存活动”，希恩甚至将其称作“海德格尔一切哲学的最终目标”（中译本序言第8页）。在另一处，希恩也以类似的坚决口吻写道“本有的澄明之境就是海德格尔一切哲学研究的‘实事本身’。”（第250页）显然，在希恩的范式中，开抛的澄明之境与绽出之生存在本有之中的映振乃是在生存活动中以实践方式展开的，所谓的“劝导”也即劝导读者从理论转向实践——而这绝不意味着仅仅从关于理论的理论转向关于实践的理论。

因此，即使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于我们而言也仅仅是“关于实践的理论”而非实践本身。那我们还能求助于谁？在著作的最后，希恩也展开了他的劝导环节，他首先将海德格尔类比为19世纪的费尔巴哈：“向费尔巴哈与海德格尔致敬！他们的精神遗产泽被后世。经由费尔巴哈，我们学会了如何卸下形而上学的沉重外壳而独立生存。经由海

德格尔，我们学会了如何承担自身的命运，也就是说，一面让死亡悬临，一面为世界赋义。”（第383页）对于海德格尔研究者而言，这一类比或许是令人意外的，因为与海德格尔同席的这一位置似乎应该让给那两位费尔巴哈的著名批判者。在整个著作中，这两人的身影若隐若现地贯穿始终：他们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第67页），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一样对绽出之生存的某种既定样式进行了解释（第277页），而他们对费尔巴哈的评价在希恩看来尤其适合用以结束这本讨论海德格尔的著作：“他没有注意到，那项任务达成之际，主要工作仍待展开。”（第383页）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也将见到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提纲》。

潘易植

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